

中国现当代史学家研究

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

朱政惠 著



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

朱政惠 著

责任编辑：聂乐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9 字数：220,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355—1426—X/G·1421

定价：6.60 元



呂 振 羽 像

崎岖坎坷披荆斩棘驱
雳韵硝烟弹雨横剑
挥笔挥斥方遒

吕振羽先生历史学研究所
付梓书赠

政惠同志

江明

序

朱政惠同志原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他的这本《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书稿，就是在他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研究，几经修改而成的专著。欣悉这部书稿由于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关注，即将问世出版，为之由衷庆幸。吕师是我国当代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我尊敬的老师。政惠同志要我为他的书稿出版写篇序文，我感到很有意义，很有必要。兹就我对政惠同志的原稿，随笔写几点读后感，供读者参考，并以此聊抒我内心里对吕师多年缅怀之情。

我从1933年到北京中国大学读书开始，就在吕师的多年教导培育下，一步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当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论战热潮时期，吕师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创立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说、西周为封建社会说，观点鲜明，令人敬仰。我在吕师的指引、鼓舞下，也积极学习战斗，撰文响应。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我们在重庆，吕师决定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著作，并对我说：“你写一部中国社会简史，按社会形态写，我写一部简明中国通史，依朝代写，同时出版。”不久，吕师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在香港出版，我的社会简史在重庆改名为《中国历史简编》也出版了。此后，吕师辗转延安、东北地区，担任军政工作，戎马倥偬，直到全国解放，我们才又重会于京城。每次晤面，同以往一样，他总是热情地向我问暖问寒。有一次，他来上海时，问我：“你现在还在从事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吗？这个问题很重要！”真是关怀

备至。吕师学识渊博，胸怀开阔，常令我振奋不已。记得有几次我们在北京他的寓所和中央党校晤叙时，吕师曾多次和我谈起史学界应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等理论问题，还谈他关于写作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以及中国现代通史、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计划。可惜，吕师晚年连遭“文革”浩劫，身体失健；后来，虽获得自由，已力瘁身残，不幸于1980年，天难假年，哲人仙逝，匆匆离去。这岂仅是这位史学大家的悠悠遗恨，更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时间过得真快，在吕师离去的十有余年的岁月里，我们学术界的一些有关师友们晤面时，常常谈起如何更好地纪念吕师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应再召开吕振羽学术纪念会，并在会前广为约集一些学术纪念论文；还希望能有对吕师史学业绩作全面深入研究的学术史著。这不仅对研究这样一位史学大家是必要的，而且，中国革命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都需要做好这一工作。政惠同志的这本专著的完成，便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可喜的一步。

吕师治史的最根本特点就在于，他的学问文章，始终是结合现实的，结合现实选课题，结合现实阐发史学思想。他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革命而著书立说，从来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而发空谈高论。政惠同志的书是紧扣这一治史特点的，指出他的每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无不着意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无不体现当时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代脉搏和时代精神。他早年著作中所以花力气阐述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见解，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史大论战中出现的种种谬说，支持我们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发展学说和关于现实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论断。他在抗战时期问世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从宏观上勾勒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向民众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光明未来，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建国后对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业绩的阐扬，则出于全国范围内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为了促进新的国民精神的形成，坚定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新家园的决心。吕师治史的这一重要特点，政惠同志的书中一一作了具体而又扼要的揭示，这不仅在史学研究上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深切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建设者，吕师有不少开拓之功。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整理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针对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而撰，也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论研究的思想通史著作；《中国民族简史》更是这种性质的、科学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专著。对于吕师史学研究中的这些贡献，政惠同志的书中都努力作了分析。说明这些成就时，政惠同志注意把吕师的种种贡献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整个进程中考察，前后比较对照分析，因而吕师成就的地位，他比前人的卓越之处，以及若干不足，都较客观地展现于人们面前了。著者反对脱离具体历史背景，学术条件来评论史家功过的态度是正确的。

在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过程中，吕师的功绩是突出的。吕师所以成果卓著，影响巨大，得益于他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是李达的学生，早年摸索救国真理过程中，看过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最后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经济学研究转向历史学研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其他经典著作，钻研相当深。因此他进行史学研究的特点是，立点准、洞察深，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着眼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创立殷商奴隶说时，还是个青年，和当时名声已经很大，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郭沫若的殷商史前社会说相左。他能这样大胆提出不同观点，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深入把握，结合中国国情作具体分析。郭沫若在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中，自我批判了以往的旧说，承认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在史学理论的阐发上，

吕师还有很多高见。他说过，史学家必须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亲身经历一些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事件，观察历史规律。这些出自于他亲身体会的治史经验之谈，是对史学理论建设的积极贡献。关于吕师史学理论方面的这些成果，我高兴地看到，政惠同志的书中大都注意到了，而且每每做了认真的发微。

由于吕师一生治史注意立足于现实，把历史和现实结合在一起，因此，他著书立说，便得到了“源头”、“活水”那样的灵感、智慧，分析问题，就凭添了理论分析能力，勇于创新，因而也造就了他史学研究开拓面广，成就丰多的特点。今天我们一再探讨争论的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早在四十年代初，吕师就有深入的研究，他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中对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的尖锐批判的内容，讲得很全面，很辩证，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他的民族问题研究，建国后也更深入了，不仅用民族资料补充了以往史前原始社会研究的成果，而且也调整了对周代以来封建社会若干发展特点的看法。他认为，正是历代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劳动人民交错杂居、经济上密切联系的特点，决定了现实社会的国家制度和民族地方的组织形式是单一的国家制度和区域自治。吕师治史中的广博成就和深刻见解，政惠同志的研究中也一一提及了。

看了政惠同志的书后，我还有一个想法，即感到这本书的体系安排是恰当的。既照顾到了吕师一生及其治史历程，又考虑到每一历史时期吕师的其他活动和成就；正篇之外，还有很详细的著述表。因而大架构方正，细小处充实，有血有肉，有灵有魂，我以为这是一种可以肯定的写法。

至于史料，据我所知，政惠同志是下过一番苦功的。他曾到过国内好多地方搜集吕师的资料和相关史料。其中。像日本人译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篇目，都是他托在日本的友人搞来的；他还从浩瀚的史料中发现了若干苏联学

者对吕师史学成就评论的文章；在东北，他发现了吕师《中国民族简史》1947年4月大连版，纠正了通常人们所说的首版是1948年9月光华本的说法。还有不少是口碑材料。他和江明同志的谈话记录，便是颇为可贵的史料。在史料运用过程中，他十分注意区别不同年代的版本，决不把后来版本的思想强加于前者，也不把前面版本的思想代替后来的观念；力求从不同版本中反映的史学思想的变迁来揭示吕师史学思想变化的内容、特点，以及和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规律的关系。

政惠同志的这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就的，他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都是关于吕师研究的。为了做好这个研究项目，他锲而不舍，下了很大气力。他和我谈过很多次，包括吕师生平的，也包括理论研究方面的。在一个课题上搞那么多年，反复找史料、学理论，力求开掘得深一些，打出一口好井，我以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现在，他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一个果子；当然，学海迥渊，总可能会有一些疏误不足的。但我总以为，他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个可喜：第一，在于他向世人奉献了关于吕师研究的成果；第二，在于他多年的耕耘有了收获。所以我要向他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他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高一尺！

吴 泽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日于上海丽娃河滨寓所

引 言

吕振羽是当代中国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是和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齐名的大历史学家。他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积极奋斗的一生，也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为现实贡献历史智慧的一生。

无疑的，研究这样一位大家非常必要。拙著试图通过对吕振羽和他的治史成就的分析，究明其史学的时代意义和发展特点、他所以取得种种成就的原因及其治史目的论，同时探讨上述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关于吕振羽史学的时代意义，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时代的产物，也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产物。在辛亥革命成果痛遭窃取、资产阶级学说尤其是一度显得很激进的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也变得苍白无力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便相对引人注目，而这种学说，又是以科学唯物史观理论为基础的。按照这一理论，人类社会是循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依次递进发展的，最后必然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社会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几乎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同时问世的。继李大钊对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进行尖锐抨击之后，郭沫若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作了尝试性划分，并且着手撰著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编著此书时，已近三十年代，实际

上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重要一环。紧接着出现的便是吕振羽的几部书,即《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他的这几部书的目的,都是想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证明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从而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的开展提供历史依据。他当时的这些努力是成功的。事实上,这也一直是他以后治史的出发点。他的《简明中国通史》虽然上册出版于抗战时期、下册出版于解放战争时期,但目的都非常明确,即以介绍和宣传历史上中华民族光辉业绩和人民反抗黑暗的英勇斗争,鼓舞现实中的人们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即使建国后,急风暴雨式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已经过去,但在如何塑造新的国民精神、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素质方面,他的史学研究继续有新的尝试和努力。所以说,吕振羽史学是有大背景的,这个大背景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离开这个大背景,我们便不能正确认识吕振羽史学。

吕振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实践中,有一个艰巨摸索、逐步完善的过程。由于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早开拓者之一,所以他的史学成果有着明显的拓荒特色,他的几部书,如《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民族简史》等,几乎都是相关领域中堪称“第一”的、以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专著。当然,作为开拓者,其不成熟处是明显的。例如,没有现成经验,往往参考苏联、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关注这些人的研究结论,因而受其影响就难以避免,甚至出现了一些今天看来颇为不妥的陈述。然而,一位锐于进取的学者,不会不正视自己身上的不足,所以,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史学研究,编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著作,吕振羽是时加注意的,颇有“吾日三省吾身”之意。尤其在四十年代初,学术界兴起“学术中国化”讨论时,他对整个学术界、包括自己的学术文章的反省也是相当深刻的。他曾就自己最早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阐述和种族奴隶制问题的说法作过检讨,也尖锐地批评过有的学者不顾中国史

的具体内容如何，“却牵强地去迁就‘古代’希腊罗马或‘中古’日耳曼的公式”的做法。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中，吕振羽史著的版本算是较多的一个，有些著作反复修订了好几遍。这种反复修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特别受欢迎，所以每再版一次，便校勘文字一次；当然更多的还在于纠正以往的不成熟性，不断充实最新见解。这种反复修订，实际上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欠完善到较完善的过程，是“民族化”、“中国化”的深入过程，是作者的严谨的治学风格的体现。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特点。

吕振羽出生于湘西南偏僻山区，自幼即抱定救国之志。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为摧毁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奔波几十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又是史学家，于戎马倥偬之中，笔剑并用，融革命与学术于一炉。由此也形成了他史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平时所接触之人，不仅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政治家、大革命家，也有始终处于学术前沿阵地的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所以，吕振羽考虑问题，包括选题治史，往往棋高一着、气势开阔、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这又决定了他在治史理论方面的某些新鲜内容，对为什么治史、如何治史、如何使自己的历史洞察力更尖锐、更深刻，阐述相当多。他坚决反对钻象牙塔、死守古董的研究，认为历史研究要对国家、民族的千秋大业负责。这个问题，他不只在社会史大论战中讲，抗战中也反复强调。他认为历史学应对人类实践的创造的路线、方向、目标，“尽着正确的指导的作用。”至于如何治好史，除了方法论外，他强调，要深入群众的实际斗争，要深入民众，参加了具体的社会实践，“便有条件体会好过往的历史。他认为历史上的一切创造，都是千百万人的群众性的活动的结果，“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和一定程度的群众实践活动的经验”，“就无法了解历史运动的具体性和群众实践的深刻性。”这都是相当精彩的总结，是可以深深启迪后一辈人的。

末了，关于吕振羽史学的研究的意义问题。自中国史学问世以来，曾产生了奴隶主阶级史学、封建地主阶级史学、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反映不同社会形态的史学。其中，古代史学尤其是封建史学，人们研究已相当多了，成果不少；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研究也有一个时期了，有关论文、论著相继问世；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相对薄弱，可以说是才开始起步。但这样大的一个史学流派，不仅主宰当代中国史坛，也是世界史学发展的重要流派，不深入研究是不行的。从何入手呢？除了进行宏观的研究探讨外，还要进行典型的个案分析，以推动全面的宏观的认识的深化。研究吕振羽的史学，便具有这样的学术意义。吕振羽的治史生涯，从时间跨度看，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近半个世纪，几乎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从研究范围看，他参加了几乎一切重要领域的研究和学术问题的讨论，如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通史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史论关系问题讨论、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讨论，等等；从其史学实践的社会联系看，他和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华岗等很多史家有密切的学术交往关系或学术争鸣渊源。所以，研究吕振羽，究明他的学术生涯、学术思想变迁，其突出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助于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吕振羽史学发展的轨迹，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轨迹。

以上诸点，是拙著想要努力探明的问题，至于是否达到了这些目的，读者自有公论，笔者诚恳地期待各方面的热情指正、批评。

目 录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1)
一、青少年时代	(1)
二、在黑暗中摸索救国之道	(3)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	(14)
第二章 参加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和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	(24)
一、中国大学的“红色教授”	(24)
二、《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对托派、新生命派的严峻批判	(30)
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史学思想及其史学贡献	(40)
第三章 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	(55)
一、中国古史分期观点的形成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问世	(55)
二、殷商奴隶社会论及其意义	(57)
三、西周封建说及其贡献	(66)
第四章 对托派、新生命派的再批判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76)
一、又一项负有时代使命的史学研究	(76)
二、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通史	(80)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	(94)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中的笔与剑·····	(99)
一、融革命与学术于一炉·····	(99)
二、《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对秋泽修二的批判·····	(104)
三、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	(117)
第六章 从事人民革命斗争和撰写人民革命通史·····	(126)
一、《简明中国通史》撰述缘起·····	(126)
二、从《本国史研究提纲》到《简明中国通史》上册·····	(130)
三、《简明中国通史》下册问世及其史学思想·····	(138)
四、对祖国多民族、多支脉历史的完篇研究·····	(148)
第七章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155)
一、《中国民族简史》的撰写·····	(155)
二、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史著作·····	(158)
三、《中国民族简史》的史料来源和调查研究方法·····	(174)
第八章 开国初期的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宣传·····	(177)
一、建国初的“双肩挑”·····	(177)
二、爱国主义史学思想的新阶段·····	(180)
三、强调从人民出发治史的史学观·····	(186)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史学研究新成就·····	(190)
一、对《简明中国通史》的修订·····	(190)
二、民族问题研究及其新成就·····	(202)
三、到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中国历史讲稿》·····	(217)
第十章 最后的奉献·····	(243)
一、艰难的岁月·····	(243)
二、最后一笔史学遗产·····	(246)
三、历史的回音·····	(254)
附 录 吕振羽著述目录辑要·····	(259)
后 记·····	(272)

第一章 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一、青少年时代

吕振羽，原名吕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1901年出生于湖南武冈金秤市溪田村。武冈旧隶宝庆府，1913年后改隶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区，今属湖南邵阳市。这里的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绵延不绝，忧国爱民的志士层出不穷。明成化年间苗族李再万、清道光年间瑶族雷再浩的青莲教均起义于此，清末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民国初年的杰出将领蔡锷也诞生在这里。

吕振羽的曾祖父曾因生活所迫，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曾祖母是用八百铜钱买来的瑶人。祖父一辈也颇窘困，“终生刻制生活于其时物质水平下”，^①祖母是因瘫痪症而嫁不出去的闺女，倒贴入门。母亲也出身贫寒，家中仅几亩薄田，过门后，“于生育外，全家之炊爨、针黹、纺织、园艺诸劳动”一力担任。^②由于家境不佳，农村卫生条件差，所以吕振羽兄弟八人，“率皆强慧，而夭

①② 参见吕振羽《吕氏留念亭碑序》。《吕氏留念亭碑序》是吕振羽三十年代写的一篇碑文。1936年10月，吕振羽母亲六十寿辰，为纪念祖父、祖母劳苦一生，他们兄弟特设“纪念亭”，并写下这篇序文。序文称：“一九三六年寅历七月望六日，为吾母陈太夫人耳顺寿辰。振羽、持平仰奉慈意，停开觞庆；建此事以为纪念，并便行旅。复于亭边置地□斗□升，土一块，茶山一块，招致居停，备迷途之问讯，供过客以茶汤，又非同于生祠，意实符于大众。亭名留念，盖有二义：一为纪念两亲寿诞，一为纪念先祖鸿章公、祖母陈太夫人劳苦一生。”

亡者五”。①

在这灾难深重的年代，人民的反抗起义一再被镇压。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骇人听闻的辛丑条约再一次把惨苦的中国人抛入深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把枷锁沉重地压在亿万人民的脖架之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病症遍于国中，即使武冈这样的湘西南边隅之地，亦不能幸免。小小的弹丸之地不仅有帝国主义的洋教堂，干涉着地方行政，而且经济渗透，亦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列强商品的输入，^②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生产方式，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农业、手工业破产的情景，比比皆是。在武冈金秤，由于洋布、洋袜、洋线、洋带、洋毛巾、洋被单的输入，农家和小工匠的土纺、绩麻、家绩等，都陆续衰落，“原来从事这些行业的手工工人都相继失业，以纺、绩为副业的农民，尤其以之为生的贫民，更陷于贫困、绝境。”^③吕振羽说，他的伯祖母辛大娘、叔祖母老八娘，都是这样陷于绝境而死。外祖母家峁子塘是个干山窝窝，十来户人家无一户地主、富农，二舅、三舅、四舅、从堂表兄等，或以耕作为生，或以裁缝工、竹篾匠、纺绩为生，由于列强的侵略，洋货的流入，农业生产从此衰落，手工工人相继失业、半失业，加之病疫侵袭，“便只有四家人有后代（解放时均系贫雇农），其余均绝了户”。^③

国破山河碎的凄惨现实对吕振羽的刺激相当深。由于曾祖父参加太平天国的叛逆精神的影响，祖父、父亲都个性坚强，同情愚弱，他们常为吕振羽兄弟道农村痛苦，输援贫屈富思想，使吕振羽很早就抱定了志切大众、助弱锄强的变革旧社会的思想。诚如《吕氏留念亭碑序》所提到的：“吾父个性尤类先祖，力疾豪强，同情愚弱，常为羽兄弟道农村黑暗，至明白而易晓，于羽兄弟之生活意识，殊有至大影响。”

① 《吕氏留念亭碑序》。

②③ 《关于买办资本的特性问题——读伍丹戈〈论旧中国买办资本的寄生性〉、〈论旧中国买办资本的落后性与反动性〉》，载《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